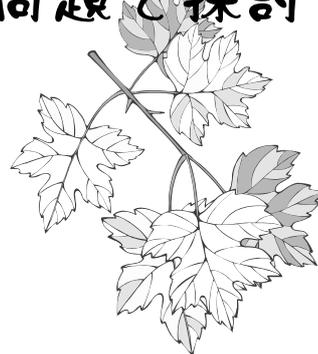


發展多元文化社會資本 因應移民婦女貧窮問題之探討

吳秀照



摘要

「移民女性化」現象是近年來國際人口流動的主要特徵之一。研究顯示，透過婚姻移民台灣的外籍與大陸配偶，其家庭有較高的比率落入貧窮。本文主要探討移民婦女在我國社會面臨貧窮與社會資本積累障礙的關係。同時並進一步分析對於在移居社會缺乏社會資本的移民婦女，政府及民間社會應創造結合多元文化的活動與機會，幫助移民婦女個人及家庭發展立基於多元文化的社會資本。同時在系統層面，亦應融入多元文化的內涵於社會經濟活動與服務規劃中，以協助移民婦女在台灣社會的網絡開拓與社會參與的平等機會。

關鍵字：多元文化、社會資本、移民婦女、貧窮

Abstract

The recent trend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has showed the significant phenomenon of “the feminization of immigration”. Research found that immigrant women who came from Southeastern Asia and Mainland China through marrying Males in Taiwan, their families had higher poverty rate than the averag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discussing the poverty of immigration women in Taiwan and their obstacles of developing social capital which might lessen the threat of poverty issues. This article also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government, social and civil organizations to develop multicultural-based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for helping immigrant women to access to the community, educational, economic, recreational and social welfare opportunities, information and activities, because all these endeavors would facilitate

immigrant women's opportunities to extend their social network.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multicultural environment, gender and class issues of immigrant women should also be noticed.

Keywords: Multiculturalism, Social Capital, Poverty, Immigrant Women

壹、前言

「移民女性化」現象是近年來國際人口流動的主要特徵之一(NNIRR, 2000; Ehrenreich & Hochschild, 2002)。2000年時,美國的「移民與難民權益全國聯結網」(National Network for Immigrant and Refugee Rights, NNIRR)出版了一篇報告,名為「塑造世界的手」(Hands that Shape the World)。這篇報告中指出,在美國,每年的新移民超過一半是婦女,而且這個數字逐年增加中。Ehrenreich及Hochschild(2002)的研究也指出,為數眾多的移民婦女是近數十年來工業先進國家底層廉價勞動力的重要來源,其中,許多第三世界女性離鄉背井投入家務與照顧服務的跨國勞動現象更引起聯合國的關注。

「移民女性化」也是亞洲國家自1990年代以來移民流動的重要發展趨勢(賴佳楓譯,2008)。雖然近年來因為經商、受聘工作、留學、戀愛結婚等因素而移居他國的移民人口越來越多;但亞洲內部人口的遷移,有兩個顯著特色:一為女性勞動移民、一為女性婚姻移民的大幅增加。前者是因應亞洲一些工業新興國家如台灣、新加坡、香港等國家地區的服務業人力需求,經由仲介從菲律賓、印尼、越南等國

受僱從事家務、看護、餐廳服務、成衣、電子裝配等典型女性工作的勞動人力;後者則多透過仲介或他人介紹等從東南亞或大陸地區嫁入日本、台灣的配偶。

從2009年6月份台灣的移民統計資料來看,在申請工作簽證的(白領)專業人士與(藍領)外籍勞工部份,前者女性占了19.7%,但後者女性則高達63.2%。若以目前在台人數相比較,白領外籍女性當期在台人數僅約5千4百人,而藍領外籍女性勞工在台人數則約21萬6千人,後者為前者的四十倍之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2009年6月)。另外,內政部移民署的統計資料也顯示,透過婚姻關係移居台灣的外籍與大陸籍女性配偶,高達婚姻移民性別比例的91.9%。也因此,探討台灣的移民問題,不僅僅是種族、文化的議題,更需敏感於性別與階級問題。

NNIRR(2000)的研究報告就指出,不管是勞動移民或婚姻移民的婦女,她們常常是經濟全球化所造成負面影響的受害者。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婦女因為母國經濟結構調整計畫所帶來的失業問題、貧窮問題、政治動盪、社會緊張、種族與宗教衝突等,而被迫必須為了家庭生存需求,離鄉背井尋找出路。換句話說,這些婦女移民的主要目的往往與改善個人或家庭的經

濟情況、尋求向上流動機會。亦即，「脫貧」或者是避免落入貧窮是多數女性移民者主要的期待。然而移民婦女往往因為身分問題、語言限制或種族、性別歧視、缺乏社會網絡等，就業上特別容易遇到障礙。許多人因為未具備公民身分，並未獲得健康、福利與勞動權益的保障。在工業先進國家的貧窮人口分析中，新移民往往是容易陷入貧窮困境的一個群體(Fujiwara, 2005)。因而，關鍵的問題是，這些新移民在往後的日子中，是否在移入國家能取得向上流動的機會與條件，改善上述困境。而這往往又關乎國家政策以及移民在移入國家的文化與社會環境之包容性。

在我國，移工係於規定年限中受僱在台灣工作，期滿即離境，較不會涉及在移居社會的貧窮與生活機會的議題。因此，在本文中我所要討論的對象，將聚焦於婚姻移民婦女在台灣所面臨的貧窮問題，特別是近年來學術研究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2002)持續關注的移民在移居社會面臨貧窮與社會資本積累障礙的關係。同時並進一步探討社會資本開拓在作為因應移民貧窮問題的策略上，應思考融入多元文化的活動與機會，幫助移民婦女個人及家庭發展立基於多元文化的社會資本，同時在系統層面，亦應融入多元文化的內涵於社會經濟活動與服務規劃中，以協助移民婦女在台灣社會的網絡開拓與社會參與的平等機會。

貳、移民婦女的貧窮因素探討

在探討移民的原因中，「推拉理論」(push-pull theory)常被引用來說明移民在推拉力量之間的跨國流動之理性抉擇過程。移民的「推力」常起於母國的經濟、政治或社會環境不利生存，例如貧窮、天災、飢荒、政治動盪或宗教衝突等，這些推力使得移民選擇出走。而對於移民的「拉力」，則來自於移入國的吸引力，包括富裕社會的生活條件、工作機會與教育機會等。因此，推拉理論強調的是移民尋求「改善生活、向上流動」的理性抉擇過程，所關注的焦點也放在移民的「結果」，也就是移民者在移入新社會後的涵化(acculturation)與同化(assimilation)的單線歷程(Light, Bhachu, & Karageorgis, 1993; Castles & Miller, 1992; Heisler, 1992; Zolberg, 1989)。

然而，有關國際移民體系(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ystems)的理論觀點則從結構性的觀點切入，強調移民是一個動態的、有歷史脈絡的、全球性的人口移動。許多國家的移民流動是基於相互依賴的需要(Massey et al., 1993; Zolberg, 1989)。移民的形成通常有其社會的結構特性，而近年來造成移民的結構性問題多來自於全球化導致的貧富不均問題、貧窮問題、人口問題、人權問題以及對於廉價外籍勞動力的運用等(Massey et al., 1993; O'Brien, 1992)。

不論是推拉理論所主張的移民個人理性抉擇或國際移民體系論點所強調的結構主導力量，我們可以想見，多數從貧窮國家移居新地的民眾莫不期待在移居國家獲得較好的生活機會與社會經濟條件。研究

也指出，當移民從母國移入，對移入地區的語言不熟悉，缺乏地方的網絡與就業資訊，與地區民眾的生活與工作習性不同時，他們很可能在尋職或就業時面臨勞動市場的排除或僅能從最基層的低階工作做起（賴佳楓譯，2008），因而也有較高的機率落入經濟資源匱乏的貧窮處境。

而就婚姻移民婦女而言，其經濟地位除了個人在移居社會所可能獲得的就業自主空間與機會外，更繫於夫家的經社條件。王永慈(2005)根據內政部 2003 年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狀況調查資料進行分析，發現外籍配偶家庭屬於低收入戶者占 1.5%，大陸配偶家庭屬於低收入戶者占 3.6%，兩者均高於全國低收入戶所占總家戶 1.08%之比率。換句話說，與本國女性相較，外籍配偶與大陸配偶均有較高機會陷入貧窮的環境中。

Potocky-Tripodi (2001)對移民經濟地位的探討，提出三個主要的理論觀點：包括強調移民個人能力條件的「人力資本論」、移民的社會支持網絡之「社會資本論」及移民所移入社會之「社區環境條件」(community context)，例如對於移民的政策、所在社區環境的工作機會與薪資、對於移民的就業歧視等。而王永慈為了探討外籍與大陸配偶家庭致貧原因，則從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勞動市場參與、同化情況與家戶特徵等因素進行分析。研究發現人力資本、勞動市場參與及家庭特徵等三部分，均可部分解釋外籍配偶與大陸配偶家庭的致貧原因。例如，在人力資本方面，外籍配偶、大陸配偶與她們所嫁之台籍配

偶，多以國中以下教育程度者居多。在勞動市場參與部分，外籍配偶與大陸配偶無工作者均超過 60%以上；而前者之台籍配偶約有 30%無工作，後者之台籍配偶則超過 50%以上無工作。在家庭特徵部分，兒童人數越多及兒童不健康數越多者越容易陷入貧窮。王永慈的分析也指出，在台灣居住時間越久或是有身分證的大陸配偶，能減低成為低收入戶家庭的機會，但此點並未適用於外籍配偶。也因此，王永慈特別強調對於外籍配偶更應該加強社會融入的服務，以助其改善家庭經濟。

從上述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人力資本薄弱及勞動市場參與機會缺乏或無法參與生產活動可能是外籍配偶及大陸配偶家庭有較高比率落入貧窮的重要原因。但是單從人力資本強化（如提供職業訓練）或勞動市場參與機會（如提供就業資訊、工作機會等），是否就能解決外籍與大陸配偶家庭的貧窮困境，似乎還缺乏足夠的資訊論證，例如前述王永慈中指出的家庭個別生活環境脈絡與社會資本因素等所造成的影響力則需要進一步研究。

在兩千年時，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舉辦「社會資本形成與降低貧窮」國際研討會中，與會人員對於社會資本是否有助於降低貧窮，有許多的爭辯與討論。多數認為，對於移民或貧窮民眾而言，社會資本是貧窮者在生活空間中的重要網絡，不但使得窮者不至於在社會中被孤立，更有助於其經濟資源的開拓或獲得支援。因此，包括國家與民間組織，均應積極扮演協助貧窮者開拓社會資本的角

色。而國內雖有其它文章探討大陸及外籍配偶的社會（網絡）資本議題，並建議協助外籍配偶開拓社會資本的重要性（如王秀燕，2007），但多未深入探討移民在移居社會的社會資本的內涵，也未見對外籍配偶可能涉及的重要社會網絡有較細緻的分析。這也促使我想從過去的研究中的一些觀察與體會，初探外籍配偶日常生活經驗中可能涉及的重要社會網絡，並希望日後能透過進一步研究瞭解台灣女性移民的社會資本與其開拓經濟資源、突破貧窮處境的關係。

參、女性移民的社會關係網絡(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一詞，最早可能是美國人漢妮芬(Lyda J. Hanifan)於 1916 年提出。她認為在我們日常生活的社會單位中，成員間所建立的相互信任、善意、互助與互諒等關係，透過長期積累，可以創造出共同的社會資源，並有助於成員取得生活支持，滿足個人經濟、社會需求、提昇社區生活條件。上述關係透過個人、工作、社團參與或生意上的網絡連結而累積互動，成為社會集體的資源。她稱之為「社會資本」。用白話來說，「社會資本」即指的是網絡資源(social network resources)。從個人層次上來說，「社會資本」就是個人透過互惠的社會網絡可以取得的資源，包括「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及「社會影響力」(social leverage)。以就業的女性來說，來自網絡的社會支持可以幫助個人擁有較正面的能

量以及較彈性的人力、時間或其它資源去因應每日生活的要求與壓力，例如臨時接送小孩、金錢上的周轉或情感的支持等。

「社會影響力」則指的是運用網絡關係，獲得社會流動，如轉換工作、提昇工作技能、獲得升遷等機會等(Domínguez & Watkins, 2003)。

Kawachi, Kennedy & Glass 則認為，社會資本從個人層面來說，可視為個人可及(access)與所擁有(possess)的社會關係與社會網絡；從系統層面來說，是一個社會組織為了成員相互利益而促進彼此合作的組織面貌，而社會凝聚力正是一個組織擁有社會資本的必要條件。換句話說，如果一個社會無法協助弱勢民眾參與融入社會生活的脈絡與環境之中，表示這個社會為其成員所建構的社會資本是不足的（引自 Ward & Baker, 2005）。而 Coleman (2000) 則強調社會資本是存在於行動者之間的關係結構。這些關係結構形成社會的連結組織(connective tissue)，進而促進人們建立信任關係、發展合作能力。所以，社會資本是社群共享的公共財，是社群成員追求與期待不斷積累的網絡。他們的觀點進一步清楚點出了社會資本並不只是個人所擁有的特質條件，也是個人發展人力資本、累積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的環境條件。因此，它也是社群的共同責任。

「社會資本」既是互惠的社會網絡資源，那麼，個人擁有什麼樣的網絡關係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再者，對於資源缺乏的弱勢家庭來說，原有的社會資本也可能相對薄弱，如果要能獲得社會資本的支持，

那麼他們要如何開發進入新網絡，進而獲得網絡的支持，同時又能對於網絡資源的累積以及網絡成員的需求有所回饋，就是一個必須細緻觀察分析的議題。因為網絡的進入需要的不只是能力，它更是一種「身分」的取得與「關係」的呈現。

從前述學者對於社會資本的界定，我根據過去研究與實務上對於外籍配偶訪問與觀察的經驗，思考在台灣的外籍配偶可能經營與發展社會資本的社會關係網絡，大致可概念化為四個部分：

一、(移民)原鄉親友網絡

許多研究移民議題的文獻均指出，新移民初入移居地的前幾年，其原鄉的親友網絡，是新移民情感上、經濟上及社會生活適應上的重要參考與支持系統。尤其在經濟生活上，新移民往往透過其原鄉親友網絡獲得就業機會或就業資訊，甚至提供住屋或照顧年幼子女的協助，使其得以參與經濟生產活動，獲得維生資源。在社會適應上，原鄉親友常常扮演新移民融入移居社會的資訊提供、學習與引導的窗口。在情感支持上，原鄉親友更是排解鄉愁、結交新友的重要管道(Lyons & Snoxell, 2005)。

對於外籍或大陸配偶而言，有部分可能嫁入台灣之前已有原鄉親友在台，甚且有可能由於原鄉親友的牽引而嫁到台灣；有部分則在嫁入台灣後，透過非正式或正式機會（如外籍配偶識字班）的接觸慢慢累積擴大。原本，原鄉親友網絡可能是外籍或大陸配偶在台灣由陌生到適應社會生

活的重要支持系統，但是，這個網絡的建立與發展，卻可能與下述的在地親屬、鄰里網絡產生衝突，進而限制其原鄉親友社會網絡的經營發展與社會資本的累積。

二、在地親屬、鄰里網絡

在地親屬、鄰里是外籍或大陸配偶移居台灣後，由夫家的親屬關係而連結，或由於在地區位共同生活的空間特性而發展的鄰里關係。這個網絡對移民融入移居社會的日後生活異常重要，因為它是移民日常生活的生產消費、休閒、宗教、社交聯誼等活動的互動網絡或生活需求的互助支援網絡。在特定區位的共同生活空間中，透過上述活動促進鄰里間的生活交疊，進而發展彼此間的接納與認可、互信與互助。在地親屬、鄰里的「牽引」是外籍或大陸配偶參與在地生活的重要管道；隨著參與密度增加，社區民眾對外籍與大陸配偶的接納度有可能逐漸增強，進而淡化原先對外籍與大陸配偶的排斥與隔離，有助於深化外籍與大陸配偶的社會融入。

然而，若外籍或大陸配偶在社區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以族群為主要互動網絡的緊密關係（意即上述的移民原鄉親友網絡），往往在社區中容易突顯為不同於一般社區民眾日常生活網絡的異質群體，反而可能會對社區居民產生壓力與威脅，進而對參與在地社區鄰里網絡的發展產生隔閡與限制。尤其在台灣地狹人稠、鄉間社區中親屬連帶關係較強的環境中更可能有此困擾。因此，如何鬆動原鄉移民親屬網絡與社區親屬鄰里網絡間的界限，促進彼此

交流與互動，進而成為移民社會支持網絡的拓展（而非衝撞與限制），是社區民眾與實務工作者在社區生活空間中必須創造與突破的。

三、就業連結網絡

就業是移民主要獲取經濟資源、改善個人與家庭生活以及融入移居社會的主要方式。研究勞動市場區隔的相關研究指出，種族與性別的變項均對勞動市場職業隔離的現象有顯著影響，但前者的影響力較後者大。Bradley (1996)指出，性別職業隔離的現象與男女性的社會網絡有關。研究也顯示，男性移民與女性移民的社會網絡有顯著的性別差異。與男性比較，女性移民的社會網絡通常較小、同質性也較高。女性通常與親友有較多的連結，而與同事的關係網絡則較弱。男性移民則有較高非親屬的、與工作相關的社會網絡 (Schrover, Van der Leun & Quispel, 2007)。

美國學者 Granovetter (1973)早就指出社會資本對於就業機會的掌握具有重要意義，卻常常被忽視。有效的就業聯繫網絡之特性包括：1.有較廣的社會連結；2.與有良好網絡關係者的經常接觸；3.網絡間的重疊性較低；4.有較高比率的弱連結 (weak-ties) 網絡；5.在想要工作的地區有想要僱用員工的雇主；6.當工作機會出現時有人會想到你的網絡；7.有非常重要的網絡接觸者 (prestigious contacts)。通常網絡越廣、網絡接觸頻率較高時，也較容易找到工作。

對於外籍或大陸配偶而言，如果要能

透過就業取得經濟資源，網絡關係--尤其是弱連結網絡的發展就極為重要。因為，原鄉移民的網絡雖然可能提供就業機會或訊息，但其工作機會的同質性較高也較窄，要拓展較廣的工作機會，必須從原鄉親友網絡往外突破，因此，如何與在地社區民眾、社會團體相互融入，進而拓展網絡的廣度與深度，以提高其就業機會的選擇性與避免被主觀排斥，是移民必須學習的功課，也是整體社會必須加強努力的部分。

四、非營利組織與政府的福利網絡

近年來，民間自助團體、非營利組織以及政府福利系統，對於外籍與大陸配偶融入社會生活，避免社會排除的議題均相當重視，因而政府多方結合民間團體開辦外籍配偶識字班、駕駛訓練班、職訓班等提升個人人力資本的課程，另外也加強外籍配偶的社會與生活適應之課程提供等。這些課程或服務，某個程度來說，具有「搭橋」幫助外籍配偶跨入社區、就業或其他社會網絡的功能，但這種搭橋的作用卻較偏向單向通行，而缺少雙向交流，或者其產生的結果可能僅促成移民原鄉親友網絡更緊密的結合，因而開拓社會資本的網絡銜接點仍然有限。從社會資本作為移民，尤其是女性移民發展個人獲得經濟資源的網絡組織思考，外籍配偶需要更多與本地居民互相交流融合的機會，才能累積較多不同的社會網絡協助其突破經濟資源不足的障礙。

肆、三個外籍配偶的案例

幾年前，在研究訪談過程中，曾經接觸過幾位令我印象深刻受訪外籍配偶。當時，我的研究主要是探討家有發展遲緩兒童的外籍配偶教養與照顧子女的經驗。訪談過程中，卻深深體會到，除了照顧發展遲緩子女的問題外，經濟與社會關係的壓力更是這些母親每日生活中最困擾的問題。外籍配偶在移入台灣後，或多或少會與原鄉的移民產生互動進而發展較緊密的關係(bonding capital)。但這種網絡關係的發展，有時不受夫家親友歡迎，即使在地社區的鄰居，也會有所存疑，因而造成原鄉移民的關係網絡與在地社區鄰里網絡的發展之間產生矛盾與摩擦，甚而弱化了其搭橋連接其他網絡的機會(bridging capital)。再者，長期的經濟資源不足，使得其親朋等社會網絡系統逐漸疏離與瓦解，加上公民身分尚未取得以及對於移民語言與工作能力的貶抑，更使得其透過就業獲得經濟資源的機會大為不足。以下透過三個案例幫助讀者進一步理解這些外籍配偶網絡資源的限制問題：

香藍與她的先生幾年前在越南因為工作認識，進而相戀。後在父母的支持鼓勵下，香藍決定隨夫婿返回台灣定居。由於香藍有華僑背景，剛住居到先生家鄉時，鄰里及親友均相當照顧她，有時需要臨時外出，兒子也可以放心委託鄰居親友照顧。可是，由於家中常有嫁入台灣的外籍配偶出入，傾吐在台生活的困境，逐漸的，她發現鄰居開始對她家經常出入外籍配偶

頗有微詞，甚至猜疑她們聚集的目的，對她也越來越疏遠。這種情況讓香藍十分困擾。尤其，香藍鑒於兒子日漸長大，家庭經濟壓力越來越大，原想託鄰居幫忙帶小孩以方便出去找工作的計畫，也因為與鄰居變質的關係而暫時停頓....。

秋月則是有個就讀幼稚園、學習速度較為緩慢的小孩，秋月被幼稚園老師批評因為家裡經常有外籍配偶及其子女出入，導致其小孩缺乏正確而優良的學習環境，孩子才會在學習上發生混淆、進展緩慢的狀況。秋月為了孩子的學習，跟他的同鄉親友表明不希望他們帶孩子來家裡，因而與原鄉親友發生衝突。而原鄉親友原本幫她一起在家裡做車縫代工，賺取微薄薪資。因為孩子的事件，原鄉親友不願再幫忙，秋月也面臨接單卻趕工不及的窘境...

美珠嫁入台灣已十年，國台語均相當流利。因為有一個罕見疾病的小孩，醫療支出龐大，因而經常向親友借貸。長久以往，因為還不出錢，親友逐漸交惡疏離，她與先生只好搬離原地。在新遷入的社區中，她們家的鐵門多數時候總是拉下，因為她不想讓鄰居對他們指指點點。美珠想出去工作，但礙於三名子女需要照顧，只能在附近打零工。有一次，她跟社工人員談到生活的孤寂與無助，社工人員告訴她附近有外籍配偶識字班，她宛如抓到浮木，希望從原鄉親友的支持中得到慰藉。而她內心有一個更深的期待，希望這個網絡，可以讓她發展進口原鄉物資的販賣點...

三個案例當然不足以說明移民女性的

貧窮困境與原因，但是在我所訪談的對象中，卻讓我敏感到外籍配偶困在移民的原鄉親友網絡與在地社區網絡的衝撞間，不易找到出路。即使在面臨必須開拓經濟資源，突破經濟困境的當頭，這些外籍配偶仍受制於不易發展社會網絡尋求工作機會的難題，印證了前述研究中論及女性移民社會資本的特性。因此，我們可以想見為何外籍配偶與大陸配偶多需藉由民間福利組織與國家資源接軌正式社會網絡以獲得協助解決經濟困境。但是我們現有的社會救助法規，對於未具有公民身分的移民婦女給予的支持仍相當有限，而勞動市場也多視移民婦女為次級市場的勞動人力，工作機會不穩定、工作辛苦卻薪資微薄。

從社會資本的觀點來看，社會網絡對於移民經濟困境的舒緩以及工作機會的獲得有重要影響，也是重要基礎。當女性移民多受困於網絡狹小、連結性強的親友或同鄉組織而不易突破經濟或就業困境時，不論民間組織或政府部門的服務方案，應有必要思考協助女性移民開拓與發展「多元」的社會網絡之規劃與策略，並增進移民與社區之雙向交流互動，以增加其就業機會之網絡發展機會，強化其社會融入與社會參與。不過，強化移民婦女的社會融入與社會參與，除了移民者本身能力（包括語言、工作技能、文化學習）的加強外，更重要的是國家與社會必須深刻體認創造一個有助於移民開拓社會網絡的環境條件之必要性。而這個環境條件，即是願意接納多元文化交融、提供移民自由的空間與平等機會，在移入社會中學習新文化與開

創生活機會，同時，也容許其在母國文化中的情感連結與生活方式。下一個部分，我想從環境系統層面，進一步探討立基於多元文化協助外籍與大陸配偶發展社會資本之必要性。

伍、立基於多元文化的社會資本開拓之必要性

多元文化(multiculture)是西方社會在移民的人口遷移及性別、階級、身心障礙、文化等社會運動中發展出來的概念。它挑戰 1960 年代以前，西方社會以「同化」觀點及策略作為對待移民及不同族群所造成的問題，主張一個民主開放的社會應該觀照不同族群的特性，尊重及接納其不同文化背景及生活方式，創造多元文化融合的空間，提供少數族群及弱勢者平等的機會與資源，以融入社會環境。在這樣的觀念下，「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可以說是一種價值、態度、目標或回應移民及社會需求的策略(Kincheloe & Steinberg, 1997)。

我們可以想見，通常多數人會選擇一個有共同語言、價值及生活方式的社會作為安身立命的環境。在這樣的社會文化中，它對成員的意義在於有歸屬感(membership)與被認同感，進而形成「我群」的想像界線。(Margalit & Rae, 1990; 轉引自 Kymlicka, 1995)。換句話說，擁有共同文化與生活空間，往往也是人們形成社會網絡關係的環境基礎。前述的「同化」觀點即基於這樣的邏輯，認為一個與移居

社會不相容的文化，會讓移民的選擇與機會也跟著降低。因此，移民必須努力學習新社會的語言與文化，放下母國文化的包袱，融入新社會的生活習慣與生活方式，才能為自己開拓立足新社會的機會。但是，Margalit 及 Rae 兩位學者認為要移民放棄母國文化、快速融入移居社會，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不僅在於文化的學習與轉化是一個緩慢漸進的過程，而且文化成員身分具有「高度的社會意象」(high social profile)，具有相同的文化身分不但影響他人如何看待與回應我們，也進而影響自我的身分定位。

也因此，對於移民而言，其在新社會面臨最困難與需要去調適的地方，即在於如何在原生社會的文化與新社會的文化中找到平衡點，建立新的文化成員身分定位。再者，新移民對新環境的文化基礎薄弱，語言不熟悉、生活習慣不同等，加上與移居社會民眾文化身分的差異，因而拓展人際網絡與尋求在新社會的生活機會也就面臨較多阻礙。

多元文化主義主張（註 1），「文化身份」具有成員一體感的重要意義，就移民社會而言，不同文化應該有相互交流、學習與融合的空間。這種多元文化交融空間的創造，對移民與移居社會而言有幾層意義：其一、在民主社會中，不分種族、階級、性別等，能夠提供一個尊重成員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平等之機會；其二、對於移居社會而言，移民可以在包容而開放的社會環境中，較快速的發展其能力與貢獻社會生產力；第三、這樣的文化空間有

助於社會成員的相互學習，提升社會團結 (Kymlicka, 1995)。

移民要在新社會中獲得就業、社會參與等向上流動的機會，仍然必須學習在主流社會生活與就業共通的語言、文化習慣、工作技能與工作方式等，但是移民在新社會尋求生活機會的過程中，它對於母國文化的情感需求以及在新社會中的文化學習應該被尊重與提供機會。因而，在多元文化觀點下，社會對於移民的母國文化及移民團體的生活差異性應該給予尊重與表現的空間，而對於新文化的學習，則應該提供教育、語言學習、技能學習、參與社會活動等各種機會與資源。

從上述觀點的探討，我們可以說，一個具有多元文化基礎的社會環境，也是一個幫助移民發展社會網絡關係的有利環境。而這種多元文化環境的建構，從日常的社區生活層面、移民的教育、就業尋職活動以及政府在經濟與社會福利政策的規劃等，均應納入多元文化面向的思考。

以社區生活層面來說，從前述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語言、文化相通的原鄉親友網絡，固然提供移民緊密連結的情感支持或工具性協助，但是也容易突顯為社區中的異質團體，反而可能對融入社區的鄰里網絡產生隔閡與限制，不利於新移民開拓移居社區的網絡關係。納入多元文化思考的社區活動規劃，針對上述問題，應該尊重移民與其母國文化的情感連結，同時另一方面著重於透過社區民眾交流機會（如社區婦女活動、社區家庭日、社區節慶聯歡會、社區教育或新住民服務中心的

民族節日活動等)，運用移民在日常生活中擅長且有特色的食、衣、住、人文藝術、歌唱舞蹈等特色與能力，在社區民眾的活動平台上得以展現，增進移民文化的能見度，並與社區民眾藉由文化藝術的交流，相互欣賞、瞭解、進而發展信任關係，逐步建立民眾的文化融合與社區認同感。在這樣的基礎上，移民與社區民眾的互助關係網絡也將能逐步開展。

其次，在現代社會中，教育與就業是一般人多數人取得生活資源與晉升機會的主要方式，也是建立網絡關係與形成社會資本的重要管道。然而，多數移民的主要困難也在於缺乏移居環境生活脈絡中的流利語言能力、工作技能、工作習慣與方式等。另一方面，就業環境中對於移民的偏見與歧視亦影響其生活機會與工作機會的獲得，因而移民在勞動市場參與的處境也較為弱勢。移民若是在教育與勞動參與上機會不足，自然無法透過這兩個系統發展更進一層的社群網絡關係。因此，移民的教育與就業部分是政府在協助移民融入社會生活中重要的工作。例如，在教育部分，提供移民進入義務教育的學習管道，並運用資深移民作為志工，強化新移民的語言、文字能力與文化學習。在工作技能部分，結合新移民具備的母國生活文化技

能，提供新移民職業訓練機會，作為進入職場的準備。就業部分，提供雇主僱用貧窮移民的鼓勵措施，開拓其工作機會等。當然，在這些措施的規劃上，也必須考量移民女性在接受教育、技能訓練或就業時與家庭照顧的衝突，提供必要的福利支持服務。

如前所述，多元文化主義是一種價值、態度。這種價值、態度要在社會中產生影響力，必須檢視現行福利政策規劃與服務策略上是否能考慮到移民婦女在福利服務需求的差異性，並據以設計服務輸送。也因此，就政府福利政策或民間福利團體之服務規劃上，培訓具有多元文化觀的行政與實務工作人力，是相當重要的工作。在福利服務工作的推動上，開發移民社會福利人才，結合本國專業人力共同服務移民，支持移民團體發展對於新移民提供融入新社會生活的福利與服務活動等（鄧紅風譯，2004），也是多元文化的運作特色。在關照移民婦女融入移居社會的生活能力與社會參與需求，同時又能思考移民婦女文化差異上的特殊需求，才能幫助移民婦女在多元文化的支持下，逐步發展社會資本，開創在移居社會的生活機會。

（本文作者現為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

📖 註 釋

註 1：「多元文化主義」是一個籠統而複雜的概念。Kincheloe 及 Steinberg (1997)在「改變多元文化主義」(Changing Multiculturalism)一書中，對於多元文化主義的概念有較細緻的探討，包括：保守的多元文化主義、自由的多元文化主義、多元論的多元

文化主義(Pluralist multiculturalism)、左派本質論的多元文化主義及批判多元文化主義等。本文有關「多元文化主義」的觀點，較傾向自由的多元文化主義與多元論的多元文化主義。

📖 參考文獻

- 王永慈(2005)，外籍配偶與大陸配偶家庭之貧窮分析。《台灣社會工作學刊》，4，1-32。
- 王秀燕(2007)，由社會支持網絡的形成累積外籍配偶的社會資本。《社區發展季刊》，119，84-102。
- 內政部移民署(2009)，外籍配偶人數與大陸配偶人數統計。
<http://www.immigration.gov.tw/aspcode/9805>
-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2009)，外籍專業人士暨外籍勞工在台人數統計。
<http://www.evta.gov.tw/files>
- 賴佳楓譯(2008)，Castles, S. & Miller, M. J.著(1993)，移民：流離的年代。台北：五南圖書。
- 鄧紅風譯(2004)，Kymlicka, W.著(2001)，少數群體的權利：民族主義、多元文化主義與公民權。台北：左岸文化。
- Bradley, H.(1996), **Fractured Identities: Changing Patterns of Inequ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stles, S. & Miller, M. J. (1993), **The Age of Migration**. NY: Guilford Press.
- Coleman, J. S. (2000),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In Dasgupta, P. & Serageldin (Eds.). **Social Capital: Multifaceted Perspective**. 13-39.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 Domínguez, S. & Watkins, C. (2003), Creating networks for survival and mobility: Social capital among African-American and Latin-American low-income mothers. **Social Problems**, 47, 112-133.
- Ehrenreich, B. & Hochschild, A. R. (2002), (Eds.) **Global Women: Nannies, Maids and Sex Workers in the Economy**. London, UK: Granta Books.
- Fujiwara, L.(2005), Mothers without citizenship: Asian immigrant and refugees negotiation poverty and hunger in post-welfare reform. **Race, Gender & Class**, 12(2), 121-141.
- Granovetter, M. (1973), **Getting A Job**.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 Heisler, B.S. (1992), The future of immigrant incorporation: which models? which concept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6, 623-645.

- Kincheloe, J. L. & Steinberg, S. R. (1997), **Changing Multiculturalism**. Buckingham,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 Kymlicka, W. (1995),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ght, I., Bhachu, P., and Karageorgis, S. (1993), Migration networks and im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In Ivan Light and Parminder Bhachu (eds.) **Immigr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ulture, Capital, and Ethnic Networks**.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Lyons, M. & Snoxell, S. (2005), Creating urban social capital: Some evidence from informal traders in Nairobi. **Urban Studies**, 42 (7), 1077-1097.
- Massey, D.S., Arango, J., Hugo, G., Kouaouci, A., Pellegrino, A. and Taylor, J.E. (1993),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review and appraisal.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 431-466.
- McLean, S. L. Schultz, D. A. & Steger, M. B. (2002), Introduction. In McLean, S. L. Schultz, D. A. & Steger, M. B. (Eds.). **Social Capital**, 1-17.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National Network for Immigrant and Refugee Rights (NNIRR)(2000), **Hands that Shape the World: Report on the Conditions of Immigrant Women. Five Years After the Beijing Conference**.
- O'Brien, P. (1992), German-Polish Migration: The elusive search for a German nation-stat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6(2), 373-387.
- Potocky-Tripodi, M. (2001), Micro and macro determinants of refugee economic status.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12, 314-325.
- Schrover, M; Van der Leun, J. & Quispel, C. (2007), Niches, labour market segregation, ethnicity and gender.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3(4), 529-540.
-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s (2002), **Social capital and poverty reduction: Which role for the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and the State?**
[http://digital-library.unesco.org.\(9/25/2008\)](http://digital-library.unesco.org.(9/25/2008)).
- Ward, A. C. & Baker, P. M. A. (2005), Disabilities and impairments: Strategies for workplace integration, **Behavioral Sciences and the Law**, 23(1), 143-160.
- Zolberg, A.R. (1989), The next waves: migration theory for a changing worl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3, 403-430.